

邊緣到中心的流動——論朱敦儒詞中 「身分認同」的自傳書寫

余筠珺*

摘 要

朱敦儒《樵歌》寄寓了宋室南渡前後各種「身分認同」的反思，本文透過文史互證之法以彌合詞體本事闕如的現象，試圖回歸到詞人存在的時空情境，區分《樵歌》各時期所呈現的認同面向，大抵上，從洛陽時期對故鄉古都文化的在地認同，到嶺南時期由於地域轉移而導致生活習慣的隔閡、失群的邊緣感；再到選擇北返頌揚「中興」的臨安府，洛陽與臨安的疊影引發了歸向何方的思索，加上政治場域的傾軋更使得客居的身世感到疲憊不堪，最終退隱嘉禾，繼承漁父傳統、構築園林，回歸自我生命的本真。文中藉由四個時期體現朱敦儒「身分認同」的多重面貌，在歷史處境與自我觀照的互動過程中具有相承轉變的啟悟關係，從而呈現詞體「自傳」書寫的特質。

關鍵詞：朱敦儒、樵歌、身分認同、洛陽、臨安

* 京都立命館大學衣笠総合研究機構客員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Flow from Periphery to Center: The Biographical Writing of Identity in Zhu Dun-Ru's Ci Poetry

She Yun-Chun

Visiting Researcher, The Kinugasa Research Organization,
Ritsumeikan University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Qiao Ge*” written by Zhu Dun-Ru reflected on the identities formed respectively before and after the southbound migration of the Song royalty.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d the temporal-spatial context in which Zhu’s life embedded by tracing the flow of identity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at that time. To remedy the deficiency of lacking historical evidence in the contents of the verse, this article adopted a method of two-way verific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is article embodied the multifaceted identity from four periods. First of all, Zhu identified himself with the culture of his hometown, Luo-yang. Then, he felt estrangement and perceived the gap in usual practice caused by his migration to the Ling-nan region. Subsequently, he returned to Lin-an, where prevailed an atmosphere of advocating recovery. The overlapping experiences he gained in Luo-yang and Lin-an resulted in his thinking of belonging. He also felt exhausted because of political struggle. Therefore, he chose to live in seclusion in Jia-he, where he adopted the tradition of being a fisher and constructed his own dwelling. By doing so, he realized the true essence of his life. In sum, the “*Qiao Ge*” demonstr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ographical writing because the identity issues it touched on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context and reflection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shaped a relationship of sequent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Zhu Dun-Ru, *Qiao Ge*, Identity, Luo-yang, Lin-an

邊緣到中心的流動——論朱敦儒詞中 「身分認同」的自傳書寫*

余筠珺

一、前言：世代交替下的都城與個我記憶

北宋定都於東京開封府，以西京洛陽河南府為陪都。¹靖康之亂（1125）的時代遽變引起中國史上大規模的族群遷移，宋室倉皇南遷，造成百姓生命嚴重的破裂與傷痕。²直到紹興 8 年（1139），「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³，南宋王朝才得到初步的安定。地域與身分認同的矛盾在南渡初期反復衝擊著國人的認知，直到對前朝的歷史記憶逐漸為西湖畔的笙歌所覆蓋，處在國家政經中心的臨安遂呈現京城特有的都市樣態，如引領流行風潮、象徵富貴功名等，具有特殊的表徵意義，因此「都城」是「故鄉」之外，讓人們思索「身分認同」的重要參照座標。如同艾朗諾（Ronald Egan）所說：「每一類文本都有各自的傾向和特徵，我們需要識別和評估這些傾向和特徵，了解它們如何影響我們對當時城市生活的『重構』。」⁴此處擬以活動於兩宋重要都城的詞人朱敦儒（1081-1159）為對象，透過詞家觸及認同情懷的相關作品，勾勒宋室南渡偏安這段非常時期，詞人筆下「身分認同」的碰撞斷裂、矛盾融合，以及徘徊在認同邊界時所呈現的豐富心象。

朱敦儒是少數《宋史》入傳的詞人，生平事蹟亦散見於他人之詩文集，然而史

* 本論文受益於劉少雄、劉漢初兩位先生啟發，並經諸位匿名審查人指正謬誤，獲益良多，謹此致謝。

¹ 北宋四京分別為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今洛陽）、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

² 關於靖康亂後北方「流寓人」的南遷路線，參葛劍雄：《中國移民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306。

³ 宋·陸游著，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8，頁 104。

⁴ 〔美〕艾朗諾（Ronald Egan）著，趙嗣胤譯：〈宋代文獻中的都城面面觀〉，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都市繁華——一千五百年來的東亞城市生活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93。

傳資料提供的訊息經常與傳主自身關切的面向有極大的落差，是以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認為生活的敘述經常只是一系列偶然的事件，而「別集」是這類非敘述性自傳最好的形式，個人可以藉此得到展示自己的機會。⁵朱敦儒《樵歌》共二百四十多首，雖不若自傳體的敘述直截明朗，由於天生質性偏於逸格、自我意識鮮明，詞中發話者經常以「我」、「自家」來強調主體的感思⁶，即便是其他潛藏隱性發話者的作品，仍帶有自傳性色彩。⁷張淑香指出：「作者的自畫像難免還是來自鏡中的模擬，是作者在追尋自我的身分認同與生命的意義時所賦予自己人生的一種秩序。」⁸因此《樵歌》中也穿插著現實我與理想我兩種形貌。時局變動所導致的政權轉移、空間錯置，除了對個體生命造成挫傷以致認同的混亂，更使故鄉洛陽、新都臨安成為詞人反覆記憶、書寫的地方，遊走於這幾座城市時，詞人如何以其細膩的生命體驗，在詞作中傳遞因世代變遷而引起「身分認同」的辯證，其中牽涉到家國、族群、地域、政治等認同議題，因此「身分認同」是一個具有多重層次的複雜概念。個體的「身分認同」是不斷進行動態辯證的生命歷程，認同過程所立足的「邊緣」與「中心」的相對位置，會因處境轉移、認同傾向、觀看視角等因素而呈現「流動」的特質⁹，換言之，「邊緣」與「中心」的認定是主體自我觀照的結果，在主體的內在認知與外在價值抗衡磨合的過程，將引發對生命存在或完整、或缺憾的感知，而各「認同」面向的內涵彼此間因生命的線性流動而具有相承轉變的啟悟關係。是以

⁵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陳耀紅、劉學慧譯：〈自我完整的映象——自傳詩〉，收入樂黛雲、陳珏編：《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 111-112。

⁶ 黃文吉指出《樵歌》用了許多「自家」、「自」以表現自我的句子，正因為自我之與眾不同，而易與世相忤、引起不快，是以更加崇尚自然，以避免人事紛擾。見氏著：《宋南渡詞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 116-117。

⁷ 〔日〕川合康三認為在自傳詩或抒情詩中，抒情主體除了描寫自身的變化以外，也時常將自己客體化作為觀照的對象，這種潛藏於自己內部的「另一個我」，正是自傳詩書寫的動力。見氏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頁 162。

⁸ 張淑香：〈抒情自我的原型——屈原與《離騷》〉，收入《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頁 54。

⁹ 宋國誠指出：「離散的結果導致在經歷了『邊緣向中心』（from margin to center）的流動之後，又重新在中心國家集結成一種『中心裏的邊緣』（margin within center）。」可知「邊緣」與「中心」具有相互對反的、流動的特質。見氏著：《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臺北：擎松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前言」，頁 XVIII。

下文將分述朱敦儒於洛陽、嶺南、臨安、嘉禾等四個時期各自關懷、處理的「認同」議題¹⁰，並輔以相關的歷史材料，彌合詞作本事線索闕如的空隙，進行個人與大歷史的交互論述，具體呈現《樵歌》的自傳性質，同時見證宋室南渡的時代氣氛和精神。

朱敦儒出身洛陽官宦世家，「雖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自稱「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¹¹北宋承平時流連詩酒、意氣風發，以詞名見稱，居「洛中八俊」之一¹²，因此洛陽書寫體現對古都地域文化的歸屬感，以及優游的鄉居生活。四十七歲（1127）避難南遷，輾轉由江蘇金陵、吳地，沿贛江穿度大庾嶺，流徙於兩廣，落拓他鄉成了流亡南方的邊緣人，寓居嶺南三年許。家國離散的哀戚、族群與地域的認同矛盾、南北文化差異的衝擊，於此時期穿織在朱敦儒的作品中。其後不久，朝廷宣揚中興，大舉徵辟草澤之士，朱敦儒遂被陳與義等洛陽時期的友朋舉薦入京，紹興 3 年（1133）應詔北返，5 年（1135）抵達臨安，賜進士出身，守秘書省正字，步入仕途。臨安的處境包含兩個面向：其一，從餘悸猶存的邊緣移民轉換到朝政的中心位置，生活逐漸適應之後，洛陽與臨安的疊影引發生命歸向何方的思索；其二，朱敦儒於臨安及鄰近區域歷官十載，在集體頌揚中興、宴飲享樂的風氣裡，不無隱匿了個人的聲音。而朝廷為鞏固政權的正統性，導致主張和議的秦檜（1090-1155）長期得勢，14 年（1144）秦檜肅清政敵之門生故吏，朱敦儒於 16 年（1146）因與李光（1078-1159）交通之名被劾罷職。¹³歷經詭譎的政治波瀾，朱敦儒終於在 20 年（1150）致仕歸隱嘉禾（今浙江嘉興）巖壑¹⁴，雖退居到政治社

¹⁰ 本文關於詞作分期，主要參考宋·朱敦儒著，沙靈娜注釋：《樵歌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並參酌宋·朱敦儒著，鄧子勉校注：《樵歌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下文凡《樵歌》詞作引文皆出於鄧子勉注本，僅於文後標註頁碼，不另註明。

¹¹ 元·脫脫等著：《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445，〈文苑傳〉，頁 13141。

¹² 宋·樓鑰〈跋朱巖壑鶴賦及送閭丘使君詩〉：「承平時，洛中有八俊，陳簡齋詩俊、巖壑詞俊、富季申文俊，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文俊皆為執政大臣，相與力引，巖壑之名始以隱逸召用於朝，而骯髒不偶，終以退休。」見氏著：《攻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卷 71，頁 649。然「八俊」之屬，限於資料，目前僅知詩俊、詞俊及文俊，餘者姓名未詳。

¹³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32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55，〈紹興 16 年 11 月〉，頁 175。

¹⁴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60，〈紹興 19 年 10 月〉，頁 263。

會最邊緣的角落，卻得到真正的自由，享受構築園林、漁隱禪機的樂趣，終能回歸到自我的本真。由故鄉洛陽的政治文化氛圍下的自我中心、客居陌異嶺南的邊緣自我、定居臨安時依違於政治中心與自我邊緣間的辯證、最後安居於嘉禾的生命本真，《樵歌》展示了「身分認同」視野下，對生命的自信、碎裂、磨練、圓足等自我觀照的流轉。

二、洛陽風華：古都文化的榮光與崩毀

朱敦儒的洛陽書寫，隨著生命閱歷在時間軸線上造成落差，既有現時性的反映，也有回憶式的顧念，如果參照前後期的洛陽書寫，即能凸顯不曾離開家鄉的人，對於眼前事物那種理所當然的沉醉，以及流亡他域的邊緣人對鄉愁的詠歎。¹⁵ Tim Cresswell 曾在《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透過觀念史的梳理將「地方」分成三種層次：一、每個地方都具有獨特性和特殊性；二、地方涉及地方建構的社會過程；三、人們經驗世界的方式必然是置身於地方之中，由此而得到存在的感受與意義。¹⁶ 朱敦儒洛陽書寫的地方感，適可對應於這些區分，並且蘊含其對洛陽的情感，一方面描述洛陽的地方屬性、歷史建制來傳遞其深刻的在地認同和歸屬感，一方面反映洛陽的生活樣態，以及身處其間特殊的生命情調。

（一）對古都文化的在地認同

北宋洛陽在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都有其重要性，其地理形勢甲於天下，東臨嵩嶽，境內有伊水、洛水流經，西望秦嶺，南向龍門，北依邙山，因此宋太祖

¹⁵ 〔美〕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認為流亡者「一旦離開自己的家園，不管最後落腳何方，都無法只是單純地接受人生」，並且將不斷反覆「體驗無法返回過去生活的那種折磨人的回憶。」見氏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頁 99。

¹⁶ 〔英〕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 85-86。

(927-976)、仁宗(1010-1063)年間，遷都洛陽之議屢被提及。¹⁷加上嵩山、邙山之間的鞏縣是北宋皇陵所在¹⁸，洛陽因此具有國家宗族禮法的表徵意義。此外，北宋黨爭激烈，失勢文人常移遷洛陽，如著名的「洛陽耆英會」即有多位舊黨的重要人物參加。¹⁹可以說，朱敦儒自幼身處於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地位，「不仕」看似是拒絕走向汴京權力中心的一種姿態，然而從中也表現了朱敦儒對於身處洛陽文化中心的某種自信。²⁰宋徽宗(1082-1135)政和7年丁酉(1117)，修治六年的西京大內終於順利完工，素有「朝野之望」的朱敦儒受鄉人之託作「望幸曲」²¹，祈願皇帝能行幸「西都」，因作〈望海潮〉詞云：

嵩高維嶽，圖書之淵，西都二室三川。神鼎定金，麟符刻玉，英靈未稱河山。
誰再整乾坤。是挺生真主，浴日開天。御歸梁苑，駕回汾水鳳樓間。 昇
平運屬當千。眷凝旒暇日，西顧依然。銀漢詔虹，瑤臺賜碧，一新瑞氣祥烟。
重到帝居前。怪鵲橋龍闕，飛下人間。父老歡呼，翠華來也太平年。(頁86-87)

北宋時，嵩山接連京都汴梁、西都洛陽而有「汴洛兩京、畿內名山」之稱。嵩山氣勢磅礴，「二室」為其主峰，東為太室山、西為少室山，朱敦儒以二室、三川概括洛陽雄偉的地勢，其中「伊川」、「洛浦」是洛陽人平日活動的地方，屬於集體記憶的隱喻符號，文字表面的地理現場，實則蘊含濃厚的在地情懷。除了山川形勝之外，更透過「嵩高」、「河圖洛書」的傳聞表彰洛陽歷史悠遠的文化意蘊。洛陽因據河山之險，居「天下之中」，自周平王東遷以來，共歷東漢、曹魏、西晉等九朝古都，歷代象徵王權的寶鼎重器、賞賜功臣的玉刻麟符²²，說明洛陽長久位處中原政治、文

¹⁷ 參張祥雲：《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頁20-36。

¹⁸ 南北兩宋皆歷經異族掘陵發塚之事，如清·趙昱根據《續資治通鑑》所載高宗泣見哲廟陵寢中物一事，作詩云：「回首東都老淚垂，水晶移注忍重窺。南朝還有傷心處，九廟春風盡一犁。」見清·沈嘉轍等撰：《南宋雜事詩》（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卷5，頁15b。

¹⁹ 宋·司馬光：〈洛陽耆英會序〉，收入《司馬光集》第3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卷65，頁1354-1356。

²⁰ 宋·趙善瑤云：「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見氏著：《自警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卷5，頁21。

²¹ 〈望海潮〉詞序云：「丁酉，西內成，鄉人請作望幸曲。」（頁86-87）

²² 隋煬帝以「玉麟符」賞賜留守洛陽之樊子蓋，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事見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63，〈樊子蓋傳〉，頁1489。

化、學術意義上的中心，曾是王氣所在。朱敦儒以「英靈未稱河山」為由，恭請秀異傑出、功勳卓著的徽宗行幸西京新成的「五鳳樓」等城門宮苑²³，相信徽宗為太平盛世帶來的祥瑞之氣，將能一新洛陽氣象，這同時也是西京百姓共同的企盼。²⁴朱敦儒的洛陽書寫劃定了洛陽獨特的疆界，指向古都的文化繁華並羅列山川地理的宏偉意象，由歷史的軌跡裡去尋找足以象徵古都文明的禮讚，以此表達出深刻的在地認同。

〈望海潮〉雖以對徽宗的稱頌為主，卻也不免藉由西都的文化優勢與僅次於東京的政治地位，肯定自己出身的獨特與優越感，基於這個根深柢固的在地認同感，便不難理解朱敦儒在往後苦難的歲月裡一再回顧的哀傷。然而朱敦儒的洛陽回顧具有某種傾向，詞中幾乎不就洛陽戰後的現實處境做陳述，例如當時洛陽還有翟進、翟興為首的忠義軍保護皇室陵寢，南宋並於建炎 4 年（1130）封翟興為河南府尹，同年金廷亦冊封劉豫政權以相頡頏²⁵，朱敦儒卻絕口不提北國局勢，僅是回憶著家國美好的樣貌以及遙想空無人跡的寥落景況²⁶，換言之，即使明知家鄉為異邦陵夷，不堪的現實卻被屏除在他所建構的內在世界之外，「洛陽」曾經的榮光是朱敦儒極力守護的美好圖景。

（二）洛川詩酒風流的寫意生活

未曾真正離鄉的朱敦儒是自我構築世界裡的中心，青春的生命所遭遇的挫折和得意往往顯得理直氣壯，流露出一股和外在抗衡的豪情而非真正豁達的胸襟，如其最膾炙人口的〈鷓鴣天·西都作〉，詞云：

²³ 《宋史》：「西京，唐顯慶間為東都，開元改河南府，宋為西京，山陵在焉。宮城周迴九里三百步。城南三門：中曰五鳳樓，東曰興教，西曰光政。」見元·脫脫等著：《宋史》，卷 85，〈地理一〉，頁 2103。

²⁴ 〔日〕久保田和男〈論北宋的皇帝行幸：以首都空間為中心〉提到北宋皇帝僅太祖、太宗、真宗曾到地方行幸，其餘諸帝只於開封行幸，由此可知徽宗此次並未如朱敦儒所請。參氏著，郭萬平譯：《宋代開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257-266。

²⁵ 黃寬重：〈洛陽雄豪——兩宋之際洛陽地方武力的國家認同〉，《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130。

²⁶ 朱敦儒於紹興 5 年（1135）抵達臨安後，已能掌握北地的實際情報，卻未表現於詞中，只透過想像來書寫家園，如作於仕宦初期的「空想故園池閣，捲地烟塵。」（〈風流子〉，頁 84）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漫帶疏狂。曾批給露支風敕，累上留雲借月章。
詩萬首，醉千場。幾曾著眼向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
(頁 133)

「我」出現在開頭，代表詞中個體意識的張揚，「我是」以直接判斷的語氣，清楚表明對自我的定位、對自身形象簡要的概括，並帶著堅定而無所畏懼的自信。如同希爾斯(Edward Shils)在《論傳統》提出：「個人關於其自身的形象由其記憶的沉澱所構成，在這個記憶中，既有對與之相關的他人行為的體驗，也包含著他本人過去的想像。」²⁷朱敦儒建構的自我形象，源於對自我身分的想像和記憶中的洛陽體驗。雖位處西京的中心，卻因個性或者是機遇而選擇以清疏狂放的傲氣、詼諧不羈的語調來處世，透過「清都山水郎」自我想像的身分，以天上管理山水的官職而能恣意地支配風露，並且屢次上奏希望能「留雲借月」，刻畫自身醉心風月山水的天性；相形之下，現實生活中的朱敦儒，身為「洛中八俊」之一，自然常與權貴顯要往來，其所處的社會階層以及人際網絡，適足以提供他對生命出處的反思，相較於著眼王侯的政治權位、玉樓金闕的富貴生活，朱敦儒選擇居處文化中心而退居政治邊緣。此外，「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為遊遨。」²⁸當洛人競愛牡丹時，朱敦儒亦別於流俗而「插梅花住洛陽」，以花葉不同時的梅花所象徵的高雅品格喻示自我的內在精神，作為自我認同的身分指標，選擇不受拘束的「市隱」生活，在「萬首」、「千場」所開顯的寬闊空間裡盡情展現詩情酒興，放棄仕宦生涯的奔競追求，「住」點出朱敦儒決意轉向內心去經營放情任性的自在生活，而「洛陽」便是他的安居之所。如〈臨江仙〉一詞云：

生長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記流年。花間相過酒家眠。乘風遊二室，弄雪過三川。
莫笑衰容霜鬢改，自家風味依然。碧潭明月水中天。誰閑如老子，不肯作神仙。(頁 122)

這首詞從四個角度反映朱敦儒洛陽時期的特色：一是摹寫出洛陽生活「閑」的動態

²⁷ [美]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著，傅鏗、呂樂譯：《論傳統》(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頁 61。

²⁸ 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4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風土記〉，頁 6。

景況；二是反思「自家風味」從而再度肯定安居洛陽的歸屬感；三為沉靜心象的投影；四則是語態的自得與狂傲。可見朱敦儒的自我形象透過表面的狂動和內在的恬靜，交織成獨特的生命情狀。自幼生長在西都如歌的太平歲月，朱敦儒在自己的生活場域中感到滿足，選擇高蹈不仕、隱身於文化名都，「隱」只是一種附庸風雅的典型象徵，實際上是過著風流才子醉入花間酒家的旖旎生活。乘風登臨「二室」嶙峋的山勢、遊覽「三川」冬日雪景，文化與自然景觀在朱敦儒漫遊的歷程中化作調弄與賞玩的對象，充分顯示親暱與逍遙的地方感。在裁剪出諸多記憶深刻的畫面之後，詞作藉由時間的過渡，透過歲月風霜的檢視再度確認「自家風味」，實際上亦是對生存領域的反省，重新確認所屬之後，依然不改初衷，情願安老於此鄉，可以說，對洛陽的在地認同始終是朱敦儒未曾猶疑的歸屬，精神安居之所適足以映現個人的天然本真，猶如一潭碧水映照著幽夜的月，朗現一天的寧靜淡泊。除了實際行動的放曠瀟灑、內在定靜的智慧，朱敦儒自我形象的構設還透過言語的諧趣，如以「老子」自稱，流露出自適其適、不受拘束的輕鬆感。

由於朱敦儒本身工書畫、擅填詞²⁹，與友朋吟風弄月、流連歌酒是他前半生的基本情調。而其對當下生活的沉醉耽溺，往往集中表現在寄情於酒色與女子愛戀場景的刻畫，與一般艷情詞並無二致，如〈菩薩蠻〉便細膩地道出洛中春情的氣氛，詞云：

風流才子傾城色，紅纓翠幃長安陌。夜飲小平康，暖生銀字簧。 持杯留上客，私語眉峰側。半冷水沉香，羅帷宮漏長。（頁 338）

〈杏花天〉詞云：

聽蟬剪葉迎秋燕。畫戟散、金鋪開遍。清風占住秦箏怨。樓上衙牌易晚。 飛雨過、繡幕盡捲。借水沉、龍涎旋碾。金盆弄水停歌扇。涼在冰肌粉面。（頁 191-192）

²⁹ 宋·鄧椿「軒冕才賢」條云：「秦檜當國，有攜希真畫山水謁檜，薦於上，頗被眷遇，與米元暉對御輒畫。而希真恥以畫名，輒退避不居也。」見氏著：《畫繼》，收入《學津討源》第3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3，頁10。又《宋史》：「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見元·脫脫等著：《宋史》，頁13142。

朱敦儒洛陽時期的情詞經常以「香」來烘托醉入花間的香艷綺靡，「才子佳人相見難。舞收歌罷又更闌。密將春恨繫幽歡。」（〈浣溪紗〉，頁 325）寫出幽會尋歡時以美酒歌舞助興，尋求耳目感官的聲色滿足，描寫視角往往延伸到瀟漫水沉香、龍涎香的室內，或於簾幕羅帷中調情，或將畫面定格在女子肌膚的特寫上。繹其詞筆，實深具工筆刻畫的雅興。

洛陽時期可以說是朱敦儒不曾醒的青春美夢，就這樣度過四十七年的精華歲月，直到烽火戰亂後，日後最精采的幾幕洛陽追憶，多為流亡期間所作，並且以今昔相參的對比結構為其主要模式，如同薩依德（Edward W. Said）認為流亡者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同時以拋在背後的事物以及此時此地的實況這兩種方式來看事情，所以有著雙重視角（double perspective）。」³⁰例如〈水調歌頭·淮陰作〉詞云：

當年五陵下，結客占春遊。紅纓翠帶，談笑跋馬水西頭。落日經過桃葉，不管插花歸去，小袖挽人留。換酒春壺碧，脫帽醉青樓。楚雲驚，隴水散，兩飄流。如今憔悴，天涯何處可銷憂。長揖飛鴻舊月，不知今夕烟水，都照幾人愁。有淚看芳草，無路認西州。（頁 10-11）

又如〈朝中措〉：

當年彈鋏五陵間。行處萬人看。雪獵星飛羽箭，春遊花簇雕鞍。飄零到此，天涯倦客，海上蒼顏。多謝江南蘇小，尊前怪我青衫。（頁 168-169）

如〈雨中花·嶺南舊作〉上片云：

故國當年得意，射麋上苑，走馬長楸。對葱葱佳氣，赤縣神州。好景何曾虛過，勝友是處相留。向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斷狂遊。（頁 7）

無論是飄零流落到淮陰、江南或嶺南，朱敦儒選擇「回首洛陽春」的表述姿態來與當下天涯倦客的憔悴形貌相對照，並以此來回應對時間與記憶的感知。「花朝」³¹、「春遊」等春日生機象徵五陵年少的意氣風發，至於情感無形的牽繫更使家的歸屬

³⁰ 〔美〕薩依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頁 97。

³¹ 清·汪灝等撰：《廣群芳譜》，引〈翰墨記〉云：「洛陽風俗，以二月二日為花朝節，士庶遊玩。」收入李學勤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91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卷 2，〈天時譜〉，頁 167。

感具有深刻的意義，如「小袖挽人留」寫愛情的依戀、「勝友是處相留」則寫友情的熱切真誠，「留」既傳遞人情的交互动，同時肯定了個人存在的重要價值。洛川生活的人情與青春活力，讓富貴少年充滿揮灑自己的自信與勇氣，馳騁在「射麋上苑，走馬長楸」、「雪獵星飛羽箭」的打獵場景，最能顯見出盡風頭的姿態以及縱情的速度感。

綜上所述，對古都文化的認同感，加上快意青春、人情牽繫所形成的歸屬感，洛陽時期的朱敦儒既享有外在優渥的政經文化背景，又擁有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由，離開洛陽之後的人生一直縈繞著關於洛陽的回憶，卻再也不曾回到這塊土地，洛陽也因此成為其「身分認同」的重要參照點，以理想世界的榮光及其崩毀對顯天涯倦客的寥落身世。

三、嶺南歲月：自我封閉的邊緣視角

靖康之亂是歷史上的一場浩劫，《三朝北盟會編》、《靖康稗史》等文獻記載了許多金人攻破開封之後燒殺擄掠的慘狀。³²莊綽《雞肋編》亦載「以人為糧」之事：

自靖康丙午歲（1126），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臘。³³

朱敦儒身為洛陽士族，倖免避過金兵劫掠，舉家南奔、輾轉流徙，最終隨著難民流寓到嶺南。中原文化本位向來視嶺南為蠻荒之地，由於詞人對嶺南的刻板印象，「心理上很難與當地風物認同親近。他們在詞作中總是用『蠻』字來形容當地的春江花月，就表現出這種排斥感、疏離感。」³⁴加上嶺南的氣候「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

³² 參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 658-671。

³³ 宋·莊綽著，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中，頁 43。

³⁴ 見王兆鵬著：《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頁 253。以「蠻」指稱嶺南的詞例如〈沙塞子〉：「蠻樹遠，瘴煙浮」（頁 255）、〈沙塞子〉：「蠻徑尋春春早，千點雪，已舒梅。」（頁

秋」、「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歲之間，蒸濕過半」、「一日之內，氣候屢變」³⁵，歷來謫宦遷徙至此蠻煙瘴雨之鄉，身體在適應階段多有因水土不服而致疾甚至死亡者。³⁶除了身心對異域的不適應，南方的語言、風俗、飲食等日常生活條件，也有諸多難以習慣而帶來的不便，異地風物的文化、生活差異，在在透露邊緣寄居的隔閡感。如〈卜算子〉便帶著觀察者的姿態，沒有實際涉入生活的深層內裡，而是以漂離遊居在邊陲異域的視角來描述嶺南風土的客觀情景，表現環境予人的陌生感受，詞云：

山曉鷓鴣啼，雲暗瀧州路。榕葉陰濃荔子青，百尺桄榔樹。 盡日不逢人，
猛地風吹雨。慘暗蠻溪鬼峒寒，隱隱聞銅鼓。（頁 311）

此詞運用各種感官傳達對外界的體察，拉引出多重空間維度，最終在嶺南荒涼慘淒的氣氛中徒留面對未知的茫然。上片從清曉寫起，鷓鴣啼音傳布滿山，放眼望去，綿亙的長路與遠天形成開闊的視野，暗雲卻覆上重壓，蒙上了不明朗的色調，到處是榕葉、荔子、桄榔樹等嶺南特有的植物。「盡日不逢人」暗示嶺南未受人文馴化的蠻荒，給人帶來難以預期的不安。加上嶺南氣候多變，蠻煙瘴雨忽然迅速猛烈地落下，心情頓時闌暗成慘，雨濕成寒，僚人的銅鼓聲在山溪林深處隱隱傳來，讓人對這一帶僚峒³⁷等少數民族的神祕詭譎感到陌生害怕。流落異域，詞人無心探索新環境的殊異風情，而選擇在遼闊未知的異域空間中孤絕地封閉自我，冷靜的凝視、白描的筆觸、對陌異環境鬼魅化的解讀，反映出身處邊緣的心境，因不理解、不願理解彼此的生活脈絡而造成溝通的障礙，族群彼此的劃分於焉形成對立的勢態，生活環境的隔閡、不適應，導致在自我認知上不曾間斷的矛盾衝突。

257)

³⁵ 明·蘇浚：〈氣候論〉，引自清·汪森輯：《粵西文載》，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472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卷 57，頁 23。

³⁶ 《雞肋編》卷中：「自中原遭胡虜之禍，民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饑壓寒暑力役者，蓋已不可勝計。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連年瘴癘，至有滅門。」見宋·莊綽著，蕭魯陽點校：《雞肋編》，頁 64。

³⁷ 僚峒，貴州、廣西等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地的通稱。參何光岳：《南蠻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頁 286-295。關於「僚人銅鼓」，《隋書》：「（諸僚）鑄銅為大鼓。」見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卷 31，〈地理志下〉，頁 886。又「蠻溪僚峒」，〈氣候論〉：「蠻溪僚峒，草木蔚蒼，虺蛇出沒，江水有毒，瘴氣易染。」見明·蘇浚：〈氣候論〉，引自清·汪森輯：《粵西文載》，頁 24。

白天的自我防備畫出一道截然二分、難以跨越的界線³⁸，這是對洛陽身分認同的堅持，卸下局外人疏離的姿態，朱敦儒只能在夢裡構築精神的家園。其南奔之作經常在夢裡追尋故都的美好，夢醒之「淚」、「驚」、「望」是這段客居歲月的關鍵字，如〈沙塞子〉詞云：

萬里飄零南越，山引淚，酒添愁。不見鳳樓龍閣又驚秋。 九日江亭閑望，
蠻樹遠，瘴煙浮。腸斷紅蕉花晚水西流。（頁 255）

因戰禍被迫離開故鄉，不得已萬里飄零成了遠行客，朱敦儒雖是因秋日節氣變化而驚覺時間飛逝，然而內心所「驚」的原因有二：一是戰亂的驚懼猶存，二是無家可歸。「中原亂，簪纓散，幾時收」（〈相見歡〉，頁 351）、「簪纓散，關塞阻」（〈木蘭花慢〉，頁 62）、「楚雲驚，隴水散，兩漂流」（〈水調歌頭〉，頁 11），離散經驗使人失去自己原本的身分位置，仕紳地位、財富保障、家族連結等整全的生命被打碎，時代帶來的傷痕讓朱敦儒「殘夢暗驚」（〈戀繡衾〉，頁 195），難以消解的痛苦於是化成「淚」，時序的遷移可以使之流淚、登高望鄉時「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相見歡〉，頁 352）的請願、尊前聽曲時「側帽停杯淚滿巾」（〈鷓鴣天〉，頁 136）的難以自持，甚至無端地「等閒清淚空流」（〈木蘭花慢〉，頁 62）。如果「驚」與「淚」是緣於內在的心理活動或因此而引發的生理反應，那麼「望」則將思念化成具體的行動。朱敦儒於倍思親友的重陽佳節「九日江亭閑望」，舉目只見瘴煙蠻樹，然而其所思慕想望的對象不在當下而在遠方，於是透過一次次在深夜對故鄉的想像，興發各種揣想，如「不知今夕煙水，都照幾人愁。」（〈水調歌頭〉，頁 11）、「歎故苑花空，春游夢冷」（〈木蘭花慢〉，頁 62），既憂懼夢中的家園圖景早已不復存在、驚心北歸之日遙遙無期，並且想像故土如今可能的荒頽，懸念的內容總不免帶著追憶原鄉的傷感。無法活在當下的靈魂是痛苦的，當從悠悠的思夢轉醒時，獨自承受「雲散香殘，風雨蠻溪半夜寒」（〈采桑子〉，頁 300）的孤寂更是令人磨心的苦，只能以酒消愁。早期的「酒」伴以樂，此際則是以「酒添愁」，身分的轉換連帶也改變了物件的

³⁸ 如〈醉落魄·泊舟津頭有感〉提到「鷓鴣聲裏蠻花發」、「碧城芳草應銷歇」（頁 181），異地的花是「蠻」花，故園則是「芳」草，以兩個空間的強烈對比，表達不願認同新環境的決心，以及故園淪落的哀傷。

功用和意義，因此詞的結尾處，斷腸人只是看著異域的紅蕉花歲暮猶芳³⁹，再度回到眼前的不堪。

然而離散最刻骨的體驗，不是漂泊，也不是陌生，而是永遠的無所依止、無家可歸。⁴⁰朱敦儒於客居途中幾度在理智上試圖自我寬解、並進行思理的辯證，如〈浪淘沙·康州泊船〉，詞云：

更是行人行未得，獨繫歸艖。伊是浮雲儂是夢，休問家鄉。（頁 204）

詞中以簡單的語句傳遞迭宕頓挫的情懷，「更是行人」運用領字強調「行人」的身分，漂泊離鄉的行人卻「行未得」，為何難以移動而下一個途程又在何方，「歸艖」獨自止泊在異域的渡頭，而故鄉卻如煙雲只能出現在夢境裡。透過思理來陳述現狀並以此梳導情感時，情感彷彿著落於理性的詮釋而能稍得寬慰，然而內心的悲傷卻已超出言語之外，思鄉情切卻不願再提，多一點都太沉。永遠的異鄉人在〈相見歡〉詞又云：

自是不歸、歸去有誰留。（頁 349）

「歸」與「留」反映出對故鄉的懸想。經久不歸，心裡藏著許多不安和疑惑，如果真有歸去的一日，親舊故交是否早已如同自己一般流散四方，若將熟悉的人情從洛陽抽離，重新面對受到金人夷化的殘都，歸去似乎也失去意義。朱敦儒對於歸與不歸的矛盾心情，夾雜著的是自己恐難北返的焦慮。

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載：「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眾，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夫許占寺宇之命。」⁴¹朱敦儒流落兩廣，〈浪淘沙·中秋陰雨，同顯忠、椿年、諒之坐寺門作〉一詞正表現這種依寺而居，連基本生活物質都匱乏的處境，詞云：

圓月又中秋。南海西頭。蠻雲瘴雨晚難收。北客相逢彈淚坐，合恨分愁。 無

³⁹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紅蕉花，葉瘦，類蘆簕，中心抽條，條端發花，葉數層，日拆一兩葉，色正紅，……春夏開，至歲寒猶芳。」收入《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 117 冊（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卷 8，〈花木門〉，頁 311-312。

⁴⁰ 宋國城：《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前言」，頁 XVII。

⁴¹ 宋·周密著，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2010），〈後集〉，「許占寺院」條，頁 73。

酒可銷憂。但說皇州。天家宮闕酒家樓。今夜只應清汴水，嗚咽東流。（頁 202）

中秋佳節甚至無一點薄酒可飲，只能遙敘當年的繁華盛世，北客們流離的過程，背後各有生離死別的故事，話至情動處，不禁哽咽難語，場面甚為淒清索落。如今寄人籬下的生活潛藏悲辛，如〈雨中花·嶺南舊作〉下闕詞云：

胡塵捲地，南走炎荒，曳裾強學應劉。空謾說螭蟠龍臥，誰取封侯。塞雁年年北去，蠻江日日西流。此生老矣，除非春夢，重到東周。（頁 7）

金兵的殺戮席捲中原，北方士人流亡到蠻荒的嶺南，朱敦儒褪盡洛陽詞客的豪氣，過著曳裾土族、俯仰由人的潦倒生涯，加上北返的難以確定和絕望感，面對北方被異族占據的事實，哀戚益發使人身心疲憊而顯老態。拒絕融入邊緣地域的生活以及嶺南治安敗壞等因素⁴²，促使五十多歲的朱敦儒決定在南方暫尋安頓，重新落定一個位置。不同於往昔屢次推辭仕進的徵召，朱敦儒藉由昔日的聲望及友人相助，獲得北返臨安出仕的機會。經歷苦痛、挫折、迷惘的生命由「中心」洛陽淪落到「邊緣」異域，由邊緣再度進入另一個新的政治中心時，「地域認同」的問題猶在，自我歸向的認同問題卻因為南北地域的融合滲透、政治時勢的複雜網絡而引起另一重辯證反思。

四、臨安十載：身分認同的失焦 / 疊影

紹興 5 年（1135），朱敦儒抵達臨安，時值宰相趙鼎（1085-1147）當政，親善流寓派，積極主張北伐。紹興 8 年（1138），高宗（1107-1187）和秦檜主導對金和議，為了促成和議休兵以減賦息民，起用江南士人的代表人物李光，9 年（1139）李光因與秦檜立場不和而遭罷免，12 年岳飛（1103-1142）被賜死，14 年（1144）

⁴² 據吳松弟指出，江北士人避地兩廣，加上大量流民一時湧入，廣東時聞盜賊作亂，廣西甚至因移民密度提高而影響到老虎的習性，屢傷及人。隨著社會秩序重新穩定，部分避難士民復由嶺南遷移回江南。參氏著：《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 111-116。

趙鼎、李光被轉配海南島，其門生故吏亦受牽連。⁴³秦檜長期專擅南宋朝政，朱敦儒於此暗潮洶湧的時局下，16年（1146）亦遭汪勃劾其「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19年（1149）詔許守本官致仕，20年（1150）七十歲歸隱嘉禾，然風波未息，25年（1155）秦檜強起之⁴⁴，並計畫大舉興獄⁴⁵，歷二十餘日秦檜死，又遭劾為「趙鼎之心友」。⁴⁶由政敵對朱敦儒的攻訐，以及李光〈念奴嬌〉詞序明言次韻希真體⁴⁷，可知朱敦儒在臨安時期的政治傾向。趙鼎、李光皆一度進入權力中樞，隨即又失勢，朱敦儒雖屢遭彈劾，幸能全身遠禍，然晚年受詔出仕，不免亦有依附秦檜之譏，即使是表面的依從，亦不如李綱（1083-1140）等輩之無畏進退、有為有守。⁴⁸

執掌政權的南宋王朝挾帶著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優勢從汴京南下，在認同適應杭州城的過程，選擇性地複製、移植了諸多汴京風情⁴⁹，然而基於鞏固政權正統的考量，朝廷政策宣揚「中興」實際上便決定了社群的歸屬傾向，個體的生命意識在某種程度上自然受到壓抑或者說緘默噤聲。至於北方流亡者除了需要整理國破家亡的心情，生活也需面對生疏的異地風候以及語言隔閡，其時地方志或有因時制變，增

⁴³ 〔日〕寺地遵著，劉靜貞、李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頁109-318。

⁴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秦檜喜敦儒之才，欲為其子孫楷模，敦儒已告老，強起之。……人始少其節。」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69，〈紹興25年10月〉，頁369。又《宋史·文苑傳七》謂：「時秦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為刪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見元·脫脫等著：《宋史》，頁13142。

⁴⁵ 〔日〕寺地遵著，劉靜貞、李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頁296。

⁴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秦檜既死，右正言張扶上奏言：「朱敦儒者，乃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仍將敦儒、師旦、彥博、仲巖等並行罷黜，使凶惡不有君父之臣，及陰邪奸賊交結之徒，皆知所懲艾。」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69，〈紹興27年10月〉，頁374。

⁴⁷ 李光〈念奴嬌〉小序云：「符昌言寫寄朱胡梅詞，酬唱語皆不凡，因次其韻。」見唐圭璋編，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018。

⁴⁸ 王偉勇〈南宋詞中所反映之朝政——以高孝光寧四朝為例〉指出不少南渡士大夫如朱敦儒於主和政策下，只能於期待中搖首感嘆，然而面對秦檜的政治迫害，仍有如李綱等人氣節凜然。見氏著：《詞學專題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頁414-415。兩相對照之下，朱敦儒晚年出仕一事，不免受議。

⁴⁹ 例如宋·周密「乾淳奉親」載：「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冷泉堂，至石橋亭子看古梅。……上皇宣索市食，如李婆婆雜菜羹、賀四酪麵、臟三豬胰胡餅、戈家餅食等數種。太上笑謂史浩曰：『此皆京師舊人。』各厚賜之。」見氏著：《武林舊事》（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200。味覺感官是身體最為直接真切的記憶方式，宮廷網羅汴京市食以解饞並作為封賞，彌見珍貴。

添「僑寓」、「寓賢」、「流寓」一目，以為記錄。⁵⁰除此之外，紹興末以後各階段，移民仍不斷地遷入臨安，臨安府因各族群混雜聚居而呈顯多元文化的異采，身分認同的議題於是更形複雜。⁵¹反觀江南在地人的立場，一方面受到外來者強烈的文化衝擊，同時生存的空間被剝奪，臨安城中大量移居的北人甚至多於南人⁵²，曾經對國族的文化想像因為近距離的實際接觸，反而在認知上形成衝突。風土文化、語言習慣的多重隔閡，加上對闖入者的陌生感與不理解，造成南人、北人族群問題的激化，北人的文化優勢與南人的在地經驗，彼此間的衝突與馴化便成為一場角力。

朱敦儒就在南宋此一建立政治社會結構的初期，來到臨安這個新興都城，北人在政治交涉的過程尋求生存空間，傾向北伐者因與當權者的心意不侔而淡出政治核心。政治派系的相互傾軋、勢力消長，改變了朱敦儒原先在流亡期間的言說姿態，從中或許也體認到可能再也無法北返的現實。江南歲月同步見證了一個新都城的重構，不像在嶺南時所透發的排斥感，都城臨安是朱敦儒生命的另一個起點，只是邊緣人在接觸他者文化、融入在地生活脈絡的過程，如何安頓北國的記憶，將是自我認同的困難過程。外來者不可能永遠站在邊界觀望不動，主流與邊緣之間具有交相滲透的特質，正如范銘如所說：「外來者以為觀察的是一個『穩固』的空間，但是空間裡的他者也許正因觀察外來者有所變化；在接觸他者的文化時，外來者往往也改變了自己原來的文化位置。」⁵³隨著時間流逝，對外界的認知終會超逸出自我原先認同的框限。認同心理逐漸轉化的過程將會面臨抉擇的兩重矛盾，強化過往的記憶

⁵⁰ 「僑寓」如宋·黃籀、齊碩修，陳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元·脫因修，俞希魯纂《至順鎮江志》，「寓賢」如宋·史能之纂修《咸淳毗陵志》、宋·潛說友纂修《咸淳臨安志》，編纂條例已見於宋元方志，至於「流寓」一目，明清方志使用甚多，茲不舉例。

⁵¹ 臨安在南渡後數十年間，不斷有各種類型的移民湧入，例如乾道（1165-1173）以後北方歸正人仍穿戴金朝服裝，「臨安府士庶服飾亂常，聲音亂雅，已詔禁止。訪聞歸明、歸朝、歸正等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及諸軍又有效習蕃裝，兼音樂雜以女真，有亂風化。」見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57），〈兵15之12〉，頁7022。至寧宗嘉定元年（1208），朝廷仍「詔臨安府振給流民。」見元·脫脫等纂：《宋史》，卷39，〈寧宗紀〉，頁749。

⁵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起居舍人凌景夏說：「切見臨安府自累經兵火之後，戶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駐蹕之地，輻湊駢集，數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賈，往往而是。」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73，〈紹興26年7月〉，頁444。

⁵³ 范銘如：〈臺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綜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32。

只換得更深的空幻感，試圖淡化記憶則會帶來失根的恐懼與虛無，擺盪在認同邊界的此時，鄉關何處、歸與不歸的主題才正式浮現出來。

（一）由客居到定居的「臨安」認同

朱敦儒的生命以兩個都城作為空間座標，來到臨安這座文化之都，邊緣寓居容易觸動「江南人，江北人，一樣春風兩樣情」（〈長相思〉，頁 252）的感懷，歷來交通以「南船北馬」為別，江南水域極多，往來多以船隻連繫⁵⁴，朱敦儒常於暫泊客船時，傳達生活中微觀的實感，如〈點絳脣〉詞云：

客夢初回，臥聽吳語開帆索。護霜雲薄，溪上芙蓉落。 畫舫無情，人去天涯角。思量著，翠蟬金雀，別後新梳掠。（頁 288）

異鄉客進入吳地的生活經驗，水鄉風光寓目成悲，「箇中物色盡淒涼」（〈浪淘沙〉，頁 204）。船伕於清晨操持慣常的吳語方言閒敘一日營生之始，平凡的節奏在有心人聽來卻別具意義，「臥聽吳語開帆索」指客夢陡醒時，側身臥聽外在聲息卻如何也不甚了然，因而倍顯淒清。此詞仍以天涯客的觸景傷懷作為一貫的底蘊，但借用吳中方言「護霜」的語言意象入詞，指九月霜降而雲的節氣特色⁵⁵，顯見意識中已興發接觸另一語言系統的可能性。⁵⁶至於自稱為「客」⁵⁷，表示認知上只是暫時寄居於此，終有一天要離開。此外，紹興 8 年（1138）朱敦儒任職參軍⁵⁸，有〈點絳脣〉詞云：

春雨春風，問誰染就江南草。燕嬌鶯巧，只是參軍老。 今古紅塵，愁了

⁵⁴ 宋·吳自牧：「杭州裏河船隻，皆是落腳頭船，為載往來士賈諸色等人，及搬載香貨雜色物件等。」見氏著，符均、張社國校注：《夢粱錄》（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頁 186-187。

⁵⁵ 「方言入詩」條：「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淋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大抵多吳語也。」見宋·費袞著，駱守中注：《梁溪漫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卷 7，頁 220。

⁵⁶ 又如〈浪淘沙〉：「伊是浮雲儂是夢，休問家鄉。」（頁 204）亦以方言入詞。宋·吳曾「詩人用儂字」條：「王觀國《語林新編》云：『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吳音稱儂，其來甚久。」見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卷 1，頁 6。

⁵⁷ 〈憶秦娥〉：「吳船窄，吳江岸下長安客。」（頁 303）

⁵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左承奉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並為樞密行府諮議參軍。」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19，〈紹興 8 年 4 月〉，頁 610。又由紹興 9 年 4 月載「左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為秘書郎直秘閣」推知，朱敦儒應是本職通判臨安府而兼任參軍。

人多少。尊前好，緩歌低笑，醉向花前倒。(頁 290)

煙雨濛濛、春來草長、鶯燕嬌軟本屬江南的天然好風情，對生養於斯土的人而言原為理所當然的存在，然而緣於外來客的身分，失根的體認忍不住使朱敦儒提出「問誰染就」這類對原鄉的究詰。朱敦儒的處境近似於王德威所謂：「故鄉與異鄉也總需要經由某種位移、置換後才產生對某一方的認同或選擇。」⁵⁹由於認同辯證往往是在距離感形成之後才生發，「客居」生活的漂泊感往往加深對「故鄉」的思念，心中的舊愁反復召喚翻騰的記憶，然而當下的新生活也熱鬧地邀人參與其中，「只是參軍老」的轉折語調便透露出徘徊在認同邊界的猶豫，「愁損辭鄉去國人」(〈采桑子〉，頁 298) 的老參軍不再抵抗新生活的滲透，以保全對北方家族記憶的完整，即使「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臨江仙〉，頁 119) 在數算的歲月中老去，又「怎忍看，參西雁北」(〈柳梢青〉，頁 292) 以反照滯留南方的處境，即使「東風吹淚故園春，問我輩、何時去得」(〈鵲橋仙〉，頁 112) 思歸卻歸不得，除了流淚之外，「醉向花前倒」看似在逃避現實，卻也是另一種回應生命的姿態，畢竟「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水龍吟〉，頁 29)，連年邊患不斷，加上縱有英雄如岳飛、韓世忠等輩，卻也不見容於朝廷⁶⁰，既然北返無望，思念只徒然深化故園既實且虛的空幻感，當臨安的社會生活有所安頓，南人與北人的族群認同不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認同與選擇的背後因大環境的時空因素而雜揉著複雜的情感，因此「歸」的思索便不再只是如「洛浦鶯花，伊川雲水，何時歸得」(〈柳梢青〉，頁 292) 單向地渴望北返，其間已興發安老此鄉的念頭。

新的社經地位隨即帶來新的社群關係網絡，加上在江南繁衍子嗣、兒女成群⁶¹，朱敦儒從一個邊緣他者的觀看⁶²，隨著時間的遞進，開始尋求安居落戶，在江南再

⁵⁹ 王德威：〈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頁 159-180。

⁶⁰ 紹興 8 年起，南宋政權積極整肅岳家軍、收復兵權。參〔日〕寺地遵著，劉靜貞、李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頁 138-143。

⁶¹ 如〈點絳脣·季女生日〉(頁 296) 傳達對小女兒的祝福。

⁶² 如〈風流子〉：「看西湖畫船輕泛水，茜幄穩臨津。嬉遊伴侶，兩兩攜手，醉回別浦，歌遍南雲。」此時卻「有客愁如海，江山異，舉目暗覺傷神。空想故園池閣，捲地煙塵。但且恁痛飲狂歌，欲把恨懷開解，轉更銷魂。只是皺眉彈指，冷過黃昏。」(頁 84) 同樣處在西湖春日美景，觀「看」嬉遊者的歡樂，對顯出朱敦儒的旁觀與隔閡。

度形構了「我族」的形貌，生活實感與北國的追憶於焉形成另一種兩重對比，從原本截然二分的空間對立，此時對於南北更寄寓了雙重認同的細膩情感，身體或者心境上逐漸習慣了南方的風土，習慣是一種滲透，經時日久而成為需求上的依賴，封閉的心靈先是透露了一點空間，直到向外界敞開，他鄉輾轉成為最後停泊的終老之地，原鄉便成夢土，成為永遠的缺位。如〈漁家傲〉便映現出詞客內心關於洛陽與臨安的疊影，詞云：

畏暑閑尋湖上徑，雨絲斷送涼成陣。風裡芙蓉斜不整，沉紅影，約回萍葉波心靜。
催喚吳姬迎小艇，妝花燭焰明相映。飲到夜闌人卻醒，風雨定，
欲歸更把欄杆憑。（頁 223）

西湖美景是南宋詞人創作的重要題材，據周密《武林舊事》「都人避暑」條，崔君誕辰之六月時節，都人遊湖避暑，甚或留宿湖心。⁶³梁啟勳謂朱敦儒擅寫人間，「能把節序之盛、宴樂之同完全表現。」⁶⁴此詞便寫出攜妓消暑遊湖，沉浸在賞花飲酒的「閑」趣之中，直到夜闌更深。此時，朱敦儒已融入臨安的風土人情，「欲歸」歸向的所指不再是洛陽，而是臨安家居。然而歡樂過後「人卻醒」，「憑欄」的意識指向鎮日繫念的遠方，洛陽與臨安的歡樂哀愁便如光影相映，錯疊在朱敦儒的生命視野裡。夢中的洛陽再也無法觸及，臨安的生活也有當下的困境需要處理，在與現實磨合的過程，朱敦儒因此進入臨安的生活脈絡。

（二）頌揚中興太平的集體意識

號稱中興的南宋王朝，極力重整政治、社會結構，大歷史交織著自我、族群、國族共同營造的集體記憶，對於新皇都的感覺結構，交相錯雜地反映在對杭州的地域認同。短短十多年，經過都城政權的多方角力，家國族群的認同傾向已悄然轉向，這背後蘊含一種無奈的處境，潛在的集體意識無形中要求人扮演某種角色，新的環

⁶³ 宋·周密《武林舊事》：「六月六，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為避暑之遊。」甚至「多佔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敞大舫、設軒簾，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見前揭書，頁 83、84。

⁶⁴ 梁啟勳：《詞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下編，頁 48。

境適時提供了讓過往缺位的可能，對於朱敦儒這類流寓北人而言，洛陽的快意、南渡的倉皇，在臨安這座新興的都城裡，回憶顯得微不足道，集體意識迴避之前的失敗及北伐的議題，對太平盛世的歌詠禮讚，讓人們樂於活在西湖當下的繁華歌舞中，杭州亦如汴州。集體訴求在此時凌駕了個體的聲音，個人意識相對薄弱，這段時期的創作偏向積極正面的聲音，卻也暗含粉飾太平的意味，如〈鷓鴣天〉云：

極目江湖水侵雲，不堪回首洛陽春。天津暢飲凌雲客，花市行歌絕代人。
穿繡陌，踏香塵，滿城沉醉管絃聲。如今遠客休惆悵，飽向皇都見太平。
(頁 149)

此詞上闕鋪染追憶情懷，並速寫洛陽士女的風姿神采，下闕從往昔的繁華過渡到臨安當前的盛景，車馬、麗人川流往來於富麗的街道上而漫起香塵，整座城市沉浸在笙歌宴飲之中。朱敦儒透過「飽向皇都見太平」以自我寬慰，得逢衣食豐足的太平盛世，理應可以不再惆悵。然而當眾人皆選擇「沉醉」、選擇淡忘或刻意遺忘靖康國難時，遠行客雖已來到政治中心，卻始終帶著幾許落寞，面對高宗所宣稱的「中興」，朱敦儒表面雖說：「五陵俠少今誰健，似我親逢建武年。」(〈鷓鴣天〉，頁 128) 然而中興、太平的實質內涵，不過是一種苟且偏安之後政治宣揚的策略。類似的集體頌揚又如〈勝勝慢·詠雪〉，詞云：

紅鑪圍錦，翠幄盤雕，樓前萬里同雲。青雀窺窗，來報瑞雪紛紛。開簾放教
飄灑，度華筵，飛入金尊。鬪迎面，看美人呵手，旋浥羅巾。莫說梁園
往事，休更羨，越溪訪戴幽人。此日西湖真境，聖治中興。直須聽歌按舞，
任流香，滿酌杯深。最好是，賀豐年天下太平。(頁 90)

俗諺云「瑞雪兆豐年」，上天適時降雪即預示來年的豐收，或者以此歌頌德政。王應麟《玉海》「紹興瑞雪」條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庚寅瑞雪應時，百官謁文德殿拜表稱賀，自是歲如之，迄今不改。」⁶⁵朱敦儒以紅爐、翠幄、華筵、金尊等器物烘托出一派富貴氣象，更以昔日謝惠連〈雪賦〉擬梁園主客賦雪之勝景⁶⁶、王子猷

⁶⁵ 宋·王應麟輯：《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7)，卷 195，〈紹興瑞雪〉，頁 3584。

⁶⁶ 謝惠連：〈雪賦〉，收入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卷 13，頁 591-596。

「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的風流軼事相參⁶⁷，慶賀宋高宗此時正處「西湖真境，聖治中興」的太平歲月，傳達對盛世豐年的禮讚。

朱敦儒臨安時期的自我認同與外在價值形成衝突，卻又受到大環境的束縛，身分是位列朝官的中心人物，身世則是流寓的邊緣人，既要參與皇城迎春、國慶歡騰，又難掩遠客的惆悵。身世的哀戚、洛陽與臨安的疊影、宦宦生涯的不由自主，人世的各種遭遇於其內在生發、並存著諸多面向的情緒，因此「身分認同」的矛盾辯證於此時期最見張力，直到淡出官場，自我生命始趨於整全。

五、嘉禾漁隱：園林棲居 / 舟船止泊的自我象徵

朱敦儒在洛陽度過四十多年詩酒風流的快意生活，遭逢五六年戰亂流離的寄居歲月，又入朝十來年歷遍政海波瀾、處理身分認同的矛盾，於古稀之年歸隱浙江嘉禾，寄意於山水間。外在條件看似在暮年因政海波濤而退隱到社會邊緣，實際上卻是回歸到自我內在的中心，而選擇以構築園林、江南漁隱、禪機妙語的隱者形象，作為回應生命的姿態。⁶⁸

（一）巖壑、洛川園林的構築

朱敦儒長年繫念身世斷裂之痛，直到卜築此鄉，名其所居園亭為「巖壑」、「洛

⁶⁷ 《世說新語》載：「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見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3），下卷上，〈任誕〉第23，第47則，頁760。

⁶⁸ 廖宜方指出古代重視身分與地位，如文官、武將、不仕之人會循著自我意向，以閱讀、撰述、尋訪古蹟等形式，去追索往代的歷史記憶，作為身分認同的表徵。參氏著：《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206-211。朱敦儒晚年選擇嘉禾漁隱，實是對其歷史記憶、身分認同的實踐。

川」⁶⁹，鄉愁有所寓託而稍始抖落身心的疲憊。⁷⁰為居所命名猶如在進行自我認同的儀式，「巖壑」為高山深谷等僻遠之處，以此間接表明隱居之志，「洛川」之立意應為紀念故鄉洛陽，後世亦以「巖壑」、「洛川」稱呼朱敦儒。根據零星史料及其詞作所載，朱敦儒其時「購讀書堂於南湖濱」⁷¹，南湖即鴛鴦湖⁷²，「鴛鴦湖上，波平岸遠，酒醺魚肥。」（〈朝中措〉，頁 178）時或「吹笛月波樓下」（〈好事近〉，頁 249）、賞「金魚池」蓮⁷³，生活愜意。而「巖壑」、「洛川」之名於現存詞集各出現一次，如「巖壑一燈青，寒浸水香留客。」（〈如夢令〉，頁 357）「巖壑」或許是朱敦儒讀書創作、繪畫寫字之所，題字落款多署此名。⁷⁴至於「洛川」的園林形制、四時造景則如〈鷓鴣天〉所述：

草草園林作洛川，碧宮紅塔借風煙。雖無金谷花能笑，也有銅駝柳解眠。（頁 128）

關於「洛川」園林景致的描寫，多有慣用的表現角度，「洛川」地處僻靜，建物為碧宮亭臺、紅塔朱闌且有池沼，形制雖簡陋，然而取借天然山水作為園林換景遊賞之娛，「尋汗漫，聽潺湲，淡然心寄水雲間」（〈鷓鴣天〉，頁 140），晴烟霧雨，景致宜人。園林中植柳栽桃，春日柳邊時聞鶯聲⁷⁵、桃花似笑⁷⁶，夏時「竹粉吹香杏子丹」、

⁶⁹ 宋·李曾伯云：「洛川、巖壑皆其舊隱，今洛川不得而見矣，獨巖壑僅存。其風流篤厚，文章芳潤，散在木石間，彷彿尚可想見。」見氏著：《可齋續藁後》，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8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卷 12，〈識巖壑舊隱〉，頁 729。

⁷⁰ 如〈夢玉人引〉「賀祝聖俞」自述：「浪萍風梗，寄人間，倦為客。夢裡瀛洲，姓名誤題仙籍。斂翅歸來，愛小園蛺蝶簪簪碧。新種幽花，戒兒童休摘。」（頁 215）寫回歸園田的自在。

⁷¹ 清·許瑤光等修纂：《光緒嘉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 51，〈嘉興流寓〉，頁 92b。

⁷² 宋·王象之云：「鴛鴦湖乃郡之南湖也，湖多鴛鴦，故以名之。」見氏著：《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3，〈兩浙西路嘉興府·景物下〉，頁 183。

⁷³ 〈鵲橋仙〉小題為「和李易安金魚池蓮」（頁 114），由「月波樓」下瞰為「金魚池」。《輿地紀勝》載：「月波樓，在州西北城上，下瞰金魚池。……望而見月，其大不過如盤盂，然無有遠近，容光必照，而秀澤國也。水濱之人起居飲食與水波接，令狐君乃為此樓，以名月波，亦將攬取二者於一樓之上也。」見宋·王象之：《輿地紀勝》，頁 178。

⁷⁴ 朱敦儒〈題吳道子畫天龍八部中四部圖〉末署：「紹興丁丑重陽前一日，朱敦儒題於嘉禾巖壑。」見清·王杰、阮元等編：《欽定祕殿珠林續編》，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435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頁 306。

⁷⁵ 如〈西江月〉：「淡淡薰風庭院，青青過雨園林。銅駝陌上舊鶯聲，今日江邊重聽。」（頁 258）

⁷⁶ 如〈臨江仙〉：「綠池紅徑雨初收。穠桃偏會笑，細柳幾曾愁。」（頁 123）

「地僻池塘鷗鷺閑」(〈鷗鵠天〉, 140), 秋霜護菊, 「寒枝瘦葉更栽培」(〈浪淘沙·白菊〉, 頁 206)、「支筇駐屐, 徘徊籬畔, 弄酌金杯自泛。須添羅幕護風霜, 要留與疏梅相見。」(〈鵲橋仙·十月黃菊〉, 頁 107) 冬末初春時節更喜以梅花自比, 時共梅花笑。⁷⁷

園林主人的家居生活恬靜溫馨, 「攜酒提籃, 兒女相隨到」(〈點絳脣〉, 頁 291)、「紗帽籃與青織蓋, 兒孫從我嬉遊」(〈臨江仙〉, 頁 123), 甚至描摹日常細瑣的飲食烹調:

自種畦中白菜, 腌成甕裡黃薺。肥葱細點, 香油漫炒, 湯餅如絲。早晚一杯無害。(〈朝中措〉, 頁 165-166)

斫魚作鮓, 酒面打開香可醺。相喚同來, 草草杯盤飲幾杯。(〈減字木蘭花〉, 頁 278)

由食材選取、處理加工到料理烹煮等細節描述, 可以看出朱敦儒在享受他的日子, 這位浪跡天涯的過客, 終於有一方真正屬於自己的天地, 可以款待招呼自己的客人, 即如〈點絳脣〉云:

自家亭沼, 不問人尋討。(〈點絳脣〉, 頁 291)

朱敦儒悉心呵護這得來不易的自在, 「閑來自覺有精神, 心海風恬浪靜」(〈西江月〉, 頁 259), 並且積極地活在當下, 〈好事近〉詞云:

種成桃李一園花, 真處怕人覺。受用現前活計, 且行歌行樂。(頁 251)

如同一般風雅文人的生活品味, 朱敦儒彈琴、寫字, 如「琴上金星正照, 硯中鸚眼相青。」(〈西江月〉, 頁 259) 更喜飲酒, 晚期作品中十詞九飲, 詞中化用或指代諸多酒類名稱, 深得飲酒之趣。⁷⁸ 〈沁園春·辭會〉中敘寫其豐富的歸隱生活型態和內容, 詞云:

⁷⁷ 如〈點絳脣〉:「索共梅花笑。」(頁 291)、〈西湖曲〉:「卻共梅花依舊笑。」(頁 344)

⁷⁸ 除了「酒」字以外, 其它如洞庭春(〈西江月〉, 頁 259)、甕頭春(〈如夢令〉, 頁 360)、霞觴(〈桃園憶故人〉, 頁 232)、玉友(〈踏莎行〉, 頁 211)、香醪(〈蘇幕遮〉, 頁 200)、麴老(〈鷲山溪〉, 頁 160)、社酒(〈臨江仙〉, 頁 124)等酒名, 亦屢見於集中。

七十衰翁，告老歸來，放懷縱心。會聚星高宴，圍紅盛集，如何著得，華髮陳人。勉意追隨，強顏陪奉，費力勞神恐未真。君休怪，近頻辭雅會，不是無情。巖烏舊菊猶存，更松偃梅疏新種成。愛淨窗明几，焚香燕坐，閒調綠綺，默誦黃庭。蓮社輕輿，雪溪小櫂，有興何妨尋弟兄。如今且趁花迷酒困，心跡雙清。（頁 95-96）

朱敦儒告老辭歸後仍有許多顯貴邀其聚會應酬，因此特別寫下「辭會」，表達「放懷縱心」的心跡。嚮慕陶潛並以菊、梅象徵隱逸高格，植花蒔草以親近自然，而彈奏古琴向來為中國文士抒寫心懷的雅趣，此外，南宋初文人間盛行參禪習佛、焚香打坐，並時與僧人往來。⁷⁹相對於依紅偎翠、絲竹宴飲的喧鬧盛會，不再需要頻繁的社交往來，可以自在隨興地自為其事，朱敦儒追求「清靜」的境界，終歸繁華落盡見其「真處」。

朱敦儒晚來卜居嘉禾的隱逸形象，實際上是由自我、社群以及歷史評價等三者共構形塑而成。由朱敦儒當時的社群交游⁸⁰、以及宋元乃至清代等後世對「巖壑」園林的重修與推崇⁸¹，可以說明朱敦儒的漁隱在南宋初年享譽一時，深受文士階層、名公巨卿的推重，甚至成為後人追慕的典範。朱敦儒雖曾應和秦檜，但白璧微瑕無損其譽，仍為後人肯認。時有諸彥群英來訪，詩酒相從，講論文藝、時事，或者記錄下朱敦儒漁隱嘉禾的生活情景。⁸²例如後輩陸游（1125-1210）居越州山陰（今浙

⁷⁹ 宋·陸游〈跋雲丘詩集後〉：「宋興，詩僧不愧唐人，然皆因諸巨公以名天下。……予觀雲丘詩，平淡閑暇，蓋庶幾可以自傳者。政使不遇呂居仁、蘇養直、朱希真、王性之、范至能，亦決不泯沒。」可知朱敦儒亦與詩僧往來。見氏著：《渭南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 29，頁 262。

⁸⁰ 樓鑰云：「禾興，輔郡。紹興間寓公寄客，多時英賢。朱少卿自號巖壑，最為名勝。次如董公彌大將、方公景南雲翼、祝舜俞師龍、鮑任道仔、聞人務德，滋皆源流前輩，詞章、政事、學問、論議各有所長。公從之遊，聞見益廣。」見氏著：《攻媿集》，卷 97，〈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贈特進妻公神道碑〉，頁 934。

⁸¹ 曹淑娟認為園林地景是一處流變不拘的空間，同時也是一個開放性的文本，古園於刮除重寫的重修過程，將逐漸形成其典範意義，然而古園詮釋的意義邊界也隨著各時代文化而有所調整。見氏著：〈明清滄浪亭古園重修與歷史文化記憶〉，收入鄭毓瑜編：《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11），頁 297。

⁸² 周密附引陸游之語，云：「朱希真居嘉禾，吾嘗與朋儕謁之。聞笛聲自烟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櫂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所謂落濟川者。室中壁間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真平所留意者。簷間有珍禽，皆目所未覩。室中盤缶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其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臥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也。」見

江紹興)，以「半隱」遊走人間⁸³，對希真更是心生景慕，少時偕友謁之，至暮年仍念念不忘，筆記、文集、詩稿屢次述及希真。⁸⁴其他如張鎡（1153-1235）風流儒雅的「桂隱堂」之西宅為「安身之所」，西宅之中堂命名為「現樂堂」，特別標注是取用朱巖壑語⁸⁵，可見朱敦儒在南宋以隱逸為高格雅調的社會風潮下，已是世所公認的隱者。「巖壑」歷經六十年後歸李曾伯（1198-1265？），其時「洛川」已然傾頹，「是山是亭，在今為希真先生甘棠，地不盈數丈，一丘一壑，具體而微。」⁸⁶直到清初朱彝尊（1629-1709）也曾述及朱敦儒故址⁸⁷，可以說，朱敦儒的隱逸情趣已在文化傳統的流脈中自成一種典型，至於隱逸旨趣與自我的關涉，則更具體的展現於其對漁父傳統的重詮以及禪隱的機鋒之間。

（二）漁父傳統與禪悟機趣的言說姿態

古人遭遇不偶，經常選擇以漁樵耕讀的形式來安頓身心，藉由隱居來寄寓心跡並彰顯生命的價值和理想。朱敦儒的隱居圖像，雖有園田耕讀之隱，然而由於江南水鄉風情的地緣關係，多半以煙波釣徒、江渚吹笛的姿態，選擇隱於江湖之上，作為自我形象的構設與寫照。歷來對朱敦儒的整體評價偏向隱逸格調，如「天資曠遠，有神仙風致」⁸⁸、「多塵外之想」⁸⁹，其於洛陽時期早有此種傾向⁹⁰，只是晚年更添了

宋·周密輯：《澄懷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9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卷下，頁775。

⁸³ 陸游〈半隱齋記〉，收入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第223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卷4945，頁145。

⁸⁴ 如宋·陸游〈新涼書懷〉之四：「山川遺跡晉唐宋，水竹相望許洛居。」自注：「朱希真嘗言，山陰富水竹，有洛陽、許下氣象。」見氏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47，頁2848。

⁸⁵ 宋·周密：《武林舊事》，卷10，〈約齋桂隱百課〉，頁255-256。

⁸⁶ 《識巖壑舊隱》云：「後六十餘禩歸於我，因其故，略為之封植其壤，補苴其漏，一毫弗加以飾，志存古也。為先生以此客寓是邦，脫屣軒冕，蕭然如遺世獨立。」見宋·李曾伯：《可齋續藁後》，頁729。

⁸⁷ 清·朱彝尊云：「城南放鶴州，……或曰：『南渡初，禮部郎中朱敦儒營之以為墅，洲名其所題，雖不見地志，觀《樵歌》一編，多在吾鄉所作。』此說近是。」見氏著，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卷19，〈朱茂時〉，頁599。

⁸⁸ 宋·黃昇編，鄧子勉校點：《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收入《唐宋人選唐宋詞》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卷1，頁700。

悟此生的坦然。朱敦儒一生游離在各種認同面向的中心與邊緣，直到晚期審視生命歷程、環顧時代局勢並回應個人的關懷問題，遭逢離散、仕隱出處、參悟生死、修禪學道，如同張興武所說：「正是這種若即若離、似禪非禪的境界，使世俗和脫俗的兩類人有了共同語言，出世與入世的界線也因此被淡化。」⁹¹因此，朱敦儒晚年回歸到中國的隱士傳統，再現並展演張志和「漁父傳統」所形構的形象，並以禪語妙趣的詼諧解頤作為概括其一生的體悟。

關於唐人張志和漁父詞的流傳擬作情形⁹²，由蘇軾謫居黃州所作〈浣溪沙〉小題可知，原來的詞樂於北宋後期已經失傳，故以其他詞牌增改入樂⁹³；又黃庭堅〈鷓鴣天〉小題亦補述其人其事⁹⁴；此外，南宋高宗於紹興元年（1131）見到黃庭堅抄錄自《金奩集》中相傳為張志和詞作的書蹟，因而次韻十五首。⁹⁵可知張志和的「漁父傳統」在宋詞中自成譜系，使得自然山水的題材在詞體中有新的表現。朱敦儒於南宋初素「有詞名，以隱德著」⁹⁶，加上歸隱江南水鄉，情與景合，於是亦如蘇軾以〈浣溪沙〉櫟括張志和「七七三三七」句式的漁父詞⁹⁷，此外，《樵歌》還有六首

⁸⁹ 宋·汪莘（1155-?）：《方壺詩餘·自序》，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0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頁497。

⁹⁰ 如〈水龍吟〉：「念伊嵩舊隱，巢由故友，南柯夢，遽如許。」（頁29）

⁹¹ 張興武：《五代作家的人格與詩格》（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111。

⁹² 〔日〕村上哲見著，楊鐵嬰等譯：《〈漁父〉詞考》，《宋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307-321。並參衣若芬：〈不繫之舟：吳鎮及其「漁父圖卷」題詞〉，《思與言》45：3（2007.9），頁153-165。

⁹³ 蘇軾〈浣溪沙〉小題：「玄真子〈漁父詞〉極清麗。恨其曲度不傳，此語妙絕，故加數語，令以〈浣溪沙〉歌之。」見石聲淮、唐玲玲箋注：《東坡樂府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2000），頁251。

⁹⁴ 黃庭堅〈鷓鴣天〉小題：「憲宗時，畫玄真子像，訪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詩上之。玄真之兄松齡懼玄真放浪而不返也，和答其〈漁父〉云：『樂在風波釣是閑，草堂松桂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此余續成之意也。」見宋·黃庭堅著，馬興榮、祝振玉校注：《山谷詞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138。

⁹⁵ 《寶慶會稽續志》載「高宗皇帝大駕南巡，駐蹕會稽，暇日觀黃庭堅所書張志和漁父詞，因同其韻。」高宗皇帝御製詞前小題為：「紹興元年七月十日，予至會稽，覽黃庭堅所書張志和〈漁父詞〉十五首，戲同其韻，賜辛永宗。」見宋·張淏纂修：《寶慶會稽續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6，頁7165。

⁹⁶ 宋·葉紹翁著，沈錫麟、馮惠民點校：《四朝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丙集，〈朱希真〉，頁94。

⁹⁷ 朱敦儒〈浣溪沙〉小題為「玄真子有漁父詞，為添作」，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吳興江上綠楊

〈好事近〉小題為「漁父詞」，書寫漁父的生活情態及意境，詞云：

搖首出紅塵，醒醉更無時節。活計綠簑青笠，慣披霜衝雪。晚來風定釣絲閑，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鴻明滅。(其一，頁242)

眼裡數閑人，只有釣翁瀟灑。已配水仙宮印，惡風波不怕。此心那許世人知，名姓是虛假。一棹五湖三島，任船兒尖耍。(其二，頁243)

漁父長身來，只共釣竿相識。隨意轉船回棹，似飛空無迹。蘆花開落任浮生，長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其三，頁244)

撥轉釣魚船，江海盡為吾宅。恰向洞庭沽酒，卻錢塘橫笛。醉顏禁冷更添紅，潮落下前碛。經過子陵灘畔，得梅花消息。(其四，頁245)

短棹釣船輕，江上晚烟籠碧。寒雁海鷗分路，占江天秋色。錦鱗拔刺滿籃魚，取酒價相敵。風順片帆歸去，有何人留得。(其五，頁246)

猛向這邊來，得個音信端的。天與一輪釣線，領烟波千億。紅塵今古轉船頭，鷗鷺已陳迹。不受世間拘束，任東西南北。(其六，頁247)

遼闊的水域之中隱現漁父子然的身姿、輕舟短棹、一輪釣線、笛與酒，六則漁隱生活圖景，摹畫出人與自然冥合的恬靜。其中「舟船」意象在這組詞中具有多重表徵，船隻是漁父水上營生最簡單的配備需求，時或披霜衝雪、迎向風波，展現與自然抗衡的生的意志力，時或在靜夜裡諦觀水天新月、江烟秋色。「天與一輪釣線，領烟波千億」，千億烟波間晃蕩著孤舟釣叟，上下四方莫辨西東，漁父如常地泊止於自我內在的孤寂，微小的存在成為浩瀚無限中唯一的引領，卻又謙卑地領受自然風物所賜與的清明本真，小與大、一與多，世間相對的名相概念消融於古往今來的江面上，化歸回自然本有的波濤與寧靜。離開紅塵的漁父，獨自乘著小舟，由生活實感漸次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如其五之「風順片帆歸去，有何人留得」寫滿載漁獲而歸、自在無礙的生活姿態，其三之「隨意轉船回棹，似飛空無迹」譬況漁父運行自如、倏忽不定的形跡，其二之「一棹五湖三島，任船兒尖耍」抒發隨流四方、委運順化的心境，其四之「撥轉釣魚船，江海盡為吾宅」寫形體陶然隱身於江海漫無邊際、不

低。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簑笠將風裏戴，短蓑衣向雨中披。斜風細雨不須歸。」(頁320)

知盡頭的遼闊空間，直到泯除物我、放下追求的方向，人無須再取捨與選擇，才終於可以任意地安居於自身。其六之「紅塵今古轉船頭，鷗鷺已陳迹」則由有限的當下回視縱深的時間之流，參悟塵世生滅去住、轉瞬成空的自然律則。朱敦儒透過「漁父傳統」傳達對「虛空」的解悟，並抒寫對寧靜淡泊、內在本真以及自由的嚮慕。漁隱圖像出離紅塵的言語象喻，實與禪宗若有彷彿。

禪宗視浮世為虛幻，以直指本心、觸境遇緣為宗旨。北宋士大夫時與禪僧往來，樂於賞玩《燈錄》、《語錄》的機語問答，蔚然成風，到南宋初期，大慧宗杲（1089-1163）的「看話禪」和宏智正覺（1091-1157）的「默照禪」形成兩大體系，禪風又盛。⁹⁸朱敦儒於此風尚下，晚期詞常常流露參禪啟悟的玄趣和機鋒，然而有別於禪宗對心性修行的領會，朱敦儒詞作中的禪語主要體現為文人式的趣味，尤其針對「虛空」作議論⁹⁹，宣稱名利的虛妄，並且以「笑」的姿態來表達他的不在乎¹⁰⁰，反復闡述其人生觀，以此自我標榜。如〈念奴嬌〉便呈現出從容豁達乃至於挾帶嘲弄的生命情態，詞云：

老來可喜，是歷遍人間，諳知物外。看透虛空，將恨海愁山，一時掇碎。免被花迷，不為酒困，到處惺惺地。飽來覓睡，睡起逢場作戲。休說古往今來，乃翁心裡，沒許多般事。也不蘄仙不佞佛，不學棲棲孔子。懶共賢爭，從教他笑，如此只如此。雜劇打了，戲衫脫與歎底。（頁 45）

朱敦儒將人生比喻為一場戲，站在個人生命舞臺上，隨著自我意識的萌發，人不斷去經歷，失去所有曾帶來沉重悲痛的打擊、追求在乎的世間名相也曾造成各種精神的桎梏與磨難，時而零落為邊緣人、時而躋身社會價值的中心，看似在戲臺上扮演各種角色，然而邊緣與中心相對位置的認定，實際上卻隨著衡量的標準而不斷游移。

⁹⁸ 魏道儒：《宋代禪宗文化》（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頁 42-51。

⁹⁹ 「虛空」之義如〈臨江仙〉：「信取虛空無一物，箇中著甚商量。」（頁 126）〈鳳蝶令〉：「試看何時有，原來總是空。」（頁 345）〈如夢令〉：「遊戲，遊戲，到了元無一事。」（頁 359）〈減字木蘭花〉：「依舊多情，攬著虛空睡到明。」（頁 280）〈減字木蘭花〉：「虛空無礙，你自癡迷不自在。」（頁 282）

¹⁰⁰ 如〈洞仙歌〉：「三界外，尋得一場好笑。」（頁 69）「笑」的嘲弄姿態，容易產生如鄭騫於〈朱敦儒的樵歌〉所說：「過度白描以致乾枯淺率的作品。」見氏著：《從詩到曲》（臺北：順先出版公司，1976），頁 127。

面對得失，朱敦儒試圖尋求形上的哲思體悟卻無法真正感到脫解，直到歷遍人間萬般，年老的心態已然褪去激越的情緒，不為情緒所困，智性上也擺落儒、釋、道三家，以無目的、無關己的姿態來處世，形就「諳知物外」、不物於物的自在與超越，而能「到處惺惺地」，達至感通萬物的內在境界。因此朱敦儒的「逢場作戲」不僅是強調「歷遍人間」的放下，更從穿透世情百態「虛空」的本質，回歸到「認取自家身」（〈臨江仙〉，頁 118）的本真。唯有在自我成為最後的中心時，邊緣與中心才終於不再流動。

六、結論

朱敦儒的身世於史有傳，各期詞風隱然隨著閱歷不斷轉化。本文以「身分認同」的論旨作時間線性的貫串，實際上是回歸到人所存在的整體時空架構，以文史互證之法，彌合詞體本事線索闕如的現象，進行個人與大歷史的交互論述，以期具體呈現《樵歌》的「自傳」性質。洛陽、嶺南、臨安、嘉禾等地幾乎包括了朱敦儒一生的行跡，離開「故鄉」之後，漂泊的生命行者對「客居」、「定居」與「安居」等生存處境的解釋，牽涉到自我對「身分認同」的體認，包含家國、族群、地域、政治等多元的面向，加上認同過程具有「邊緣」與「中心」的相對位置，因主體的立場處境、觀看視角的轉移而呈現「流動」的特質，因此「身分認同」是一個具有多重層次的複雜概念。

綜上所述，《樵歌》在四個時期各自關懷、處理的「認同」議題間，具有相承轉變的啟悟關係，首先，洛陽時期表現對古都文化的在地認同，以及身處中心的快意風流。其次，朱敦儒因戰亂流落嶺南而成為社會的邊緣人物，餘悸未定、傷痛難消，且需適應陌生的異域風土，因而以旁觀的姿態凝視外在的一切，在作品中傳達因身世感傷流下的淚水。復次，直到選擇北返擔任官職，來到新的政治中心臨安，新的身分又由邊緣位置移動到中心，然而舊的身分該如何安置，便於內在形成抗拒、磨合等多重矛盾衝突，這同時也是離散江南的北人對杭州城在地認同的過渡時期景觀，

直到江南風情滲透到朱敦儒的生命視野裡，歸去不再純然只是單向的北返，加上時勢所趨，故鄉於焉成為永遠的夢土。然而面對外在政治世界的傾軋、集體意識頌揚中興太平，已使得客居天涯的邊緣身世極為疲倦。最後，晚年的朱敦儒隱退至政治社會最邊緣的嘉禾，構築洛川、巖壑園林，漁樵江渚、詠諧參禪，回歸到自我中心，如同漁父漂流江上的「舟船」沒有明確的方向，勘破了紅塵名相的虛空，只是任意地安居於自身，成為邊緣與中心的最終歸屬，才終於回歸主體價值的自我認同而不再流動。朱敦儒《樵歌》書寫的是自我生命內容的體悟，反映的卻是宋室南渡那一代人靜暗的身世，見證了大歷史共同的遭遇。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3。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宋·王應麟輯：《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7。
- 宋·史能之纂修：《咸淳毗陵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宋·司馬光：《司馬光集》第3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
- 宋·朱敦儒，沙靈娜注釋：《樵歌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
- *宋·朱敦儒，鄧子勉校注：《樵歌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宋·吳自牧著，符均、張社國校注：《夢粱錄》，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32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李曾伯：《可齋續藁後》，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84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 宋·汪莘：《方壺詩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0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收入《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117冊，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 宋·周密輯：《澄懷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9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 *宋·周密：《武林舊事》，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宋·周密著，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2010。
- 宋·張淏纂修：《寶慶會稽續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宋·莊綽著，蕭魯陽點校：《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宋·陸游：《渭南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宋·陸游著，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
- 宋·費袞，駱守中注：《梁溪漫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 宋·黃昇編，鄧子勉校點：《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收入《唐宋人選唐宋詞》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宋·黃庭堅著，馬興榮、祝振玉校注：《山谷詞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宋·黃耑、齊碩修，陳耆卿纂：《嘉定赤城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宋·葉紹翁著，沈錫麟、馮惠民點校：《四朝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趙善璵：《自警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 宋·樓鑰：《攻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 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4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潛說友纂修：《咸淳臨安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宋·鄧椿：《畫繼》，收入《學津討源》第3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 宋·蘇軾著，石聲淮、唐玲玲箋注：《東坡樂府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2000。
- 元·脫因修，俞希魯纂：《至順鎮江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元·脫脫等著：《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清·王杰、阮元等編：《欽定祕殿珠林續編》，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435冊，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清·朱彝尊著，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清·汪森輯：《粵西文載》，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472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清·汪灝等撰：《廣群芳譜》，收入李學勤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91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清·沈嘉祿等撰：《南宋雜事詩》，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57。

清·許瑤光等修纂：《光緒嘉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唐圭璋編，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

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二、近人論著

*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王偉勇：《詞學專題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

*衣若芬：〈不繫之舟：吳鎮及其「漁父圖卷」題詞〉，《思與言》45：3（2007.9），頁117-186。

何光岳：《南蠻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

吳松弟：《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宋國誠：《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臺北：擎松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范銘如：《眾裏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綜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張淑香：〈抒情自我的原型——屈原與〈離騷〉〉，收入《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頁47-74。

張祥雲：《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

張興武：《五代作家的人格與詩格》，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 曹淑娟：〈明清滄浪亭古園重修與歷史文化記憶〉，收入鄭毓瑜編：《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11，頁 297-327。

梁啟勳：《詞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 黃文吉：《宋南渡詞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黃寬重：〈洛陽雄豪——兩宋之際洛陽地方武力的國家認同〉，《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121-137。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 鄭騫：《從詩到曲》，臺北：順先出版公司，1976。

魏道儒：《宋代禪宗文化》，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日〕久保田和男著，郭萬平譯：《宋代開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日〕川合康三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日〕寺地遵著，劉靜貞、李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

〔日〕村上哲見著，楊鐵嬰等譯：《宋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英〕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美〕宇文所安著，陳耀紅、劉學慧譯：〈自我完整的映象——自傳詩〉，收入樂黛雲、陳珏編：《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 110-137。

〔美〕艾朗諾著，趙嗣胤譯：〈宋代文獻中的都城面面觀〉，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都市繁華——一千五百年來的東亞城市生活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93-109。

* 〔美〕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著，傅鏗、呂樂譯：《論傳統》，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 〔美〕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臺北：麥田出版

社，199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ao Shu-Juan.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Cang-Lang Ting (Great Wave Pavilion) and its Cultural Historical Memory." In *Wen Xue Dian Fan de Jian Li yu Zhuan Hua*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Paradigms), ed. Cheng Yu-yu, pp.297-327. Taipei: Student Bookstore, 2011.
- Edward Shils. *Lun Chuan Tong* (Tradition). (Fu keng & Lyu le, trans.). Taipei: Crown Publishing, 1992.
- Edward W. Said. *Zhi Shi Fen Zi Lu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Shan Te-Hsing, trans.).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1997.
- Huang Wen-Ji. *Song Nan Du Ci Ren* (The Ci Poets of the Transition Stage to Southern Song Dynasty). Taipei: Student Bookstore, 1985.
- [Yuan] Tuo Tuo. *Song shi*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 Hua Books, 1977.
- Wang Zhao-Peng. *Song Nan Du Ci Ren Qun Ti Yan Jiu* (The Research about the Ci Poet Groups of the Transition Stage to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Nanjing: Jiangsu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Ltd., 2009.
- Yi Ruo-Fen. "The Untied Boat: Wu Zhen and the Colophon of Fishman Painting (Yu-Fu Tu)",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45 (2007.9): 117-186.
- Zheng Qian. *Cong Shi dao Qu* (From the Poem to the Tune). Taipei: Shun Xian, 1976.
- [Song] Zhou Mi. *Wu Lin Jiu Shi* (The Old Stories of Wu Ling). Beijing: Zhong Hua Books, 2008.
- [Song] Zhu Dun-Ru. Deng Zi-Mian, note. *Qiao Ge Jiao Zhu* (Annotations on Qiao G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2010.